

历代名帖技法丛书

楷书用笔间架一百法
行书用笔间架一百法
草书用笔间架一百法
隶书用笔间架一百法
篆书用笔间架一百法

责任编辑 冯涛

ISBN 7-5080-2667-5



9 787508 026671 >

ISBN 7-5080-2667-5/J · 199

定价：9.8元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目 录

第一章 行书概述	1
第一节 行书的名称	1
第二节 行书的学习方法	2
第二章 行书名家名作	4
第三章 行书的笔法	23
第一节 点画的变化法	23
第二节 用笔的轻重法	33
第三节 笔势的强化法	35
第四节 笔画的连带法	45
第四章 行书的结字	55
第一节 点画简略	56
第二节 偏旁连带	58
第三节 行草杂糅	62
第四节 非行非草	65
第五节 非真非草	66
第六节 采择异体	72
第五章 行书的布白	76
第六章 行书的字势	89



第一章 行书概述

第一节 行书的名称

我们在阅读古代文献时,经常会碰到行书、行狎书、真行、正行、行真、行楷,以及行草、破体等名称。那么这些名称和我们今天所讲的行书在概念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搞清楚这些关系,对于正确理解古代文献,利用古代文献指导我们研习法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试作分析,以便能理清这些关系。

西晋书法家卫恒的《四体书势》谓:“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南朝宋书法家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谓:“颖川钟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征。二子俱学于刘德升,而胡书肥,钟书瘦。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张怀瓘《书断》引王愔的话说:“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元常善行狎书是也。”

由上面的引述,我们可以知道,钟繇的“行书”即是“行狎书”,是用来“相闻”的,即亲朋之间书信往来之用的。钟繇与胡昭都是从刘氏学行书的。胡氏较为接近刘氏的原貌。钟氏学刘“小异”,与胡氏相较只是“肥”与“瘦”的差别,而非笔法与结构的差别。今天刘德升与胡昭的行书,皆不可见。因此我们只能从钟繇入手,才可以了解到当时行书的原貌。钟繇见于著录的书迹有《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力命表》、《墓田丙舍帖》等。从内容上看《丙舍帖》即是用来相闻的,当属行书。然而笔致与其他真书似无差异,读者比较一下不难发现这一点。由此可知汉魏时期的“行书”与“真书”非常接近。事实上“真”出于“行”,钟繇创“真书”乃是对“刘氏行书”进一步改造令其更规整化。因此当时的行书与真书必然是极其相似的。所以虞世南《笔髓论·释行》谓:“行书之体,略同于真。”古代书论中所谓“行真”、“行楷”、“真行”、“正行”,其含义与魏晋时期“行书”含义相同,皆指“略同于真”的行书之体。

不过最晚到唐张怀瓘的时候,行书概念的范围发生了变化。张怀瓘《书议》谓:“子敬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兼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

之独绝。”在这段引述中,我们发现“行书”的范围扩大了。除了指“真行”之外,还包括了“行草”。“行草”是由王献之所创。他先是向父亲提出这一想法,所谓不若“稿、行之间”。然后在实践中进行了尝试,所谓“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并取得了成功,这就是“行草”。所以说“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王献之所创“行草”的特点是“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如王献之《廿九日帖》,其中“献之”、“何如”、“再拜”等字,俱为草书,与《丙舍》、《兰亭》通篇作行书则不同。此即所谓“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这种将“行书”与“草书”杂糅的方法,方便了实际书写的需要,在王献之以前也必然应当有之,认为是王献之所创,自然不妥。但王献之是最早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发展,并使其臻于完美的杰出代表。徐浩《论书》云:“厥后,钟善真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小令“破体”即指“行草”,其能与钟、张、右军并称,正因为其自创一体。在这里徐浩仍然将“行草”作为一种独立的字体而与“行书”并称。不过唐以后二者不再是并列关系,“行草”则包含在“行书”之中了。因此本书所阐述的行书实际包括了历史上的“行书”和“破体”两个方面。关于他们在构形上的特点,本书将在“行书的结字”一章中作专门的论述。

第二节 行书的学习方法

从上面对行书名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行书对真、草二体具有很大的依附性。因此如果是想对行书作专改的话,当是从真、草入手较好。这样看起来是多花了精力,实则事半功倍。行书是真、草之法的综合运用,先学真、草之法,再学行书,是先作分解练习,而后作综合练习。否则恐费力多而效果微。再说“行草”之法,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不知草法如何可“流便于草”,又使“草处其中间”。前贤对如何学习行书多有阐述,今选录于下,以便参阅。

蔡襄《论书》谓:“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亦不离乎楷正。”

苏轼《东坡集》谓:“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

潘天寿《美术文集》:“开始学书法,必须求法则,要正规,要从正楷开始。学正楷要知道行、草书。学行草应先学草书,再学行书,行书介于正、草之间。”

刘熙载《书概》谓:“行书行世之广,与真书略等,篆、隶、草皆不如之。然从有此体以来,未有专论其法者。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知真、草之于行,如绘事欲作碧绿,只须会合青、黄,无庸设碧绿料也。”

在对真、草二体有专门的研究与学习以后,可以选择怀仁的《集王圣教序》入手。此帖集王字,实际包括了王羲之真、行、草诸体。学习时应当对那些与真、草有别的字进行专门的研究与学习。有了这样基础以后,便可对王羲之的一系列的传世墨迹,如《兰亭序》、《丧乱帖》等,进一步地研究学习。王羲之创立了行书的最高典范,为后世历代书家所效法,因此学习行书应当将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王羲之的法帖上。有了相当的基础后,我们再对王献之及后世诸行书家作广泛的学习。这样我们便较容易明白各家的所长与所短,及其如何能在书法史上有自己的位置。一方面是向他们学习法度,另一方面也是谋求我们自己的出

路。

如果只了解真书，而未学过草书，甚至连真书也没有深入地学习，便欲学行书，则宜从行楷入手，如李邕、苏轼的行书，或《集王圣教序》中的近真的行书。待有一定基础后，便可临习“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以期能够脱胎换骨。没有真、草书的功夫，想学行书应当说是很难的。

有人主张选帖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这是不可取的。“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是至理名言。明代书画家范允临《翰蓼馆集》谓：“学书者不学晋辙，终成下品。”总之行书选帖，从《圣教》而至《兰亭》，不仅取法高，路子正，而且易于上手入帖。王澐《论书剩语》谓：“右军平生神妙，一卷《兰亭》宣泄殆尽。《圣教》有《兰亭》之变化，无其专谨；有《兰亭》之朗彻，无其遭厚。无美不臻，莫可端倪，其惟《褉帖》乎？具体而微，厥惟《圣教》。从《圣教》学《兰亭》，乃有人处。”初学选帖，不可不慎之，不然终身被误，其害不浅。

选好帖以后，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临习的问题。行书的临习与楷书稍有不同。楷书的点画虽然要求笔意连贯，但在形式上还是相对独立的，我们不妨看一笔写一笔。行书则不同，行书在笔画上已经形成牵丝连带，我们必须从整体去感受一个字的笔画轻重快慢的节奏。脑子里有某个字或一系列字的印象后，再用笔去表现出来。行书的临帖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即“心摹手追”，切不可旋看旋写。

行书的用墨与篆、隶、楷一类的正体字不同，十分讲究用墨的变化技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书家对墨法很有讲究。有的书家喜用浓墨重彩，有的喜用淡墨；有的喜欢燥，有的喜欢润。墨法的不同，也形成了书法的不同的风格。

另一个与墨法相关的问题是笔的选择，笔的不同也会形成书家或作品风格的不同。建议初学者不要使用硬毫笔，最好用长锋羊毫笔。硬毫笔性强，初学者往往误以为易于掌握，实则难以自如。羊毫笔性软，一旦书写者熟悉之后，反到挥洒自如。因此每学一部时，除了研究字法外，也应当研究墨法与笔的特点，这对我们较全面的理解和把握一部法帖是极有帮助的。

第二章 行书名家名作

孙过庭《书谱》谓“趋时适变，行书为要”。古往今来许多书家，几乎无不以行书见长。不善行书者，难入书家之门。一千多年来，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造就了许多行书大家，为我们学习行书提供了丰富而可贵的资料。为了便于初学者，了解行书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书家，以便学习时，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下面对历代行书的著名书家及代表性作品作一简明的介绍。

行书虽为汉末刘德升所创，刘德升传胡昭、钟繇。然而刘德升与胡昭皆无书迹传世。钟繇则依刘氏的行书创立楷书。因此首先为行书创立最高规范并对后世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第一人乃是王羲之。

王羲之(321-379，一说303-361，又一说307-365)字逸少。王旷之子，王导之侄。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省)人。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书法备精诸体。其行书遒媚劲健，千变万化，纯出自然。张怀瓘《六体书论》谓“行书者，……逸少则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资神纵，无以寄辞”。欧阳询《用笔论》谓“至于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唯右军王逸少一人而已”。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的评价更高，其《王羲之传论》谓“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王羲之行书传世法帖较多，如《兰亭序》(见图1)、《丧乱帖》(见图2)、《二谢帖》(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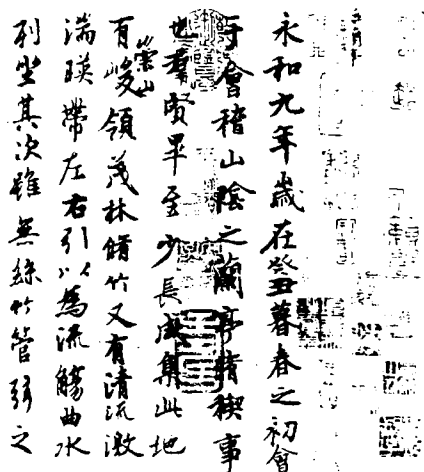


图1 王羲之《兰亭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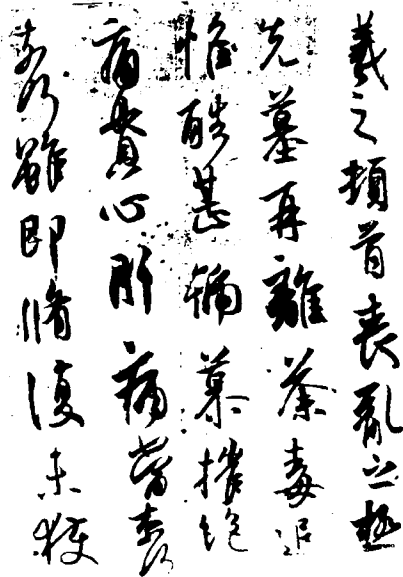


图2 王羲之《丧乱帖》

3)、《频有哀祸帖》、《快雪时晴帖》、《姨母帖》(见图4)、《奉桔帖》、《得示帖》(见图5)。而最为历代书家推崇的则是《兰亭序》，或称《兰亭宴集序》、《临河序》、《楔帖》、《楔序》等。

东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楔”时，饮酒赋诗，王羲之为之作序，并乘兴书此。文凡二十八行，计三百二十四字。书法之妙，素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称号。唐初为太宗李世民访得，命赵模、冯承素等人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后真迹殉葬没入昭陵。传世最好的摹本为《神龙本兰亭》。此摹本因有唐中宗李显的“神龙”印而得名，传为冯承素摹，故亦称“冯承素本”。元郭天锡跋曰：“其字法透逸，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毫芒转摺，纤微备尽，下真迹一等”。石刻则以《定武兰亭》为最佳。传为欧阳询摹刻于唐时内府。石晋之乱，契丹载石至定武(在今河北境内)，后世遂称《定武兰亭》。

《兰亭》之妙，历代书家多有激赏，下试作选录以便学者体会其中的奥秘。

蔡希综《法书论》云：“每书一纸，或有重字，亦须字字意殊。故何延之云‘右军书《兰亭》，每字皆构别体’，盖其理也。”

赵孟頫《跋兰亭》云：“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於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解缙《春雨杂述》云：“昔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鱼鬣鸟翅，花须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纵横曲折，无不如意，毫发之间，直无遗憾。”

朱和羹《临池心解》云：“正锋取劲，侧笔取妍。王羲之书《兰亭》，取妍处时带侧笔。余每见秋鹰搏兔，先於空际盘旋，然后侧翅一掠，翩然下攫。悟作书一味执笔直下，断不能因势取妍也。所以论右军书者，每称其鸾翔凤翥。”

方孝孺《逊志斋集》云：“学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于《语》、《孟》。羲、献余书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动容周旋中礼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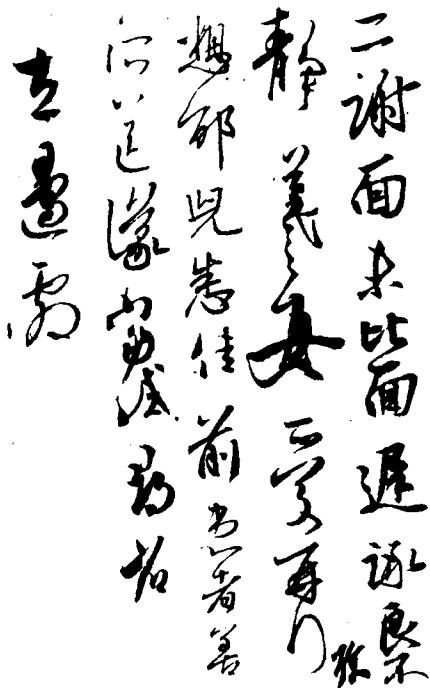


图3 王羲之《二谢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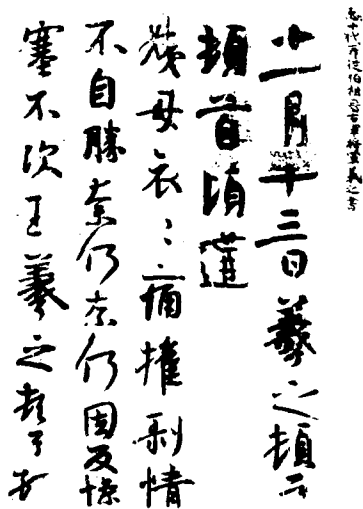


图4 王羲之《姨母帖》

包世臣《艺舟双楫》云：“《兰亭》神理在‘似奇反正，若断还连’八字。是以一望宜人，而究其结字序画之故，则奇怪幻化，不可方物。”

学习王羲之的行书还有两部重要的法帖，是首先需要深入研究的。这就是唐代怀仁的《集王书圣教序》（见图6）和僧大雅所集《吴文碑》。

《集王书圣教序》，咸亨三年（672）立于今陕西西安。太宗李世民撰序，高宗李治撰记，怀仁集字，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字。集字为碑始自怀仁，羲之书迹大都赖此以传。后人学王羲之行书，多藉此登堂入室。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题集逸少书圣教序后》称：“今观碑中字与右军遗帖所有者，纤微克肖。”明代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圣教序》称：“《圣教序》书法为百代楷模。”清代王澐《竹云题跋》称：“自唐以来，士林甚重此碑，匪直《兴福寺》、《隆阐法师》等碑为显效其体，即李北海、张司直、苏武功亦皆从此夺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圣教序》，唐怀仁所集右军书，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可谓异才。”

《吴文碑》，开元九年（721）僧大雅集晋王羲之书。其精湛仅次于怀仁所集《圣教序》。明万历（1573—1619）间出土于陕西西安。仅存下半截，故又称《兴福寺半截碑》或《兴福寺断碑》。明代安世凤《墨林快事》称：“集人大雅，乃兴福寺僧，故世谓之《兴福帖》。其集王字，顾独得其精神筋力，是以书家重之。”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然集字不止怀素，僧大雅所集之《吴文碑》，亦用右军书，尤为通峭。古今集右军书凡十八家，以《开福寺》为最。”

王羲之创立了行书的最高典范。历史上最早的“行书”，即是后来所说的“行楷”。而王献之则是创立了“破体”，即是后来所说的“行草”，从而与王羲之并列。

图5 王羲之《得示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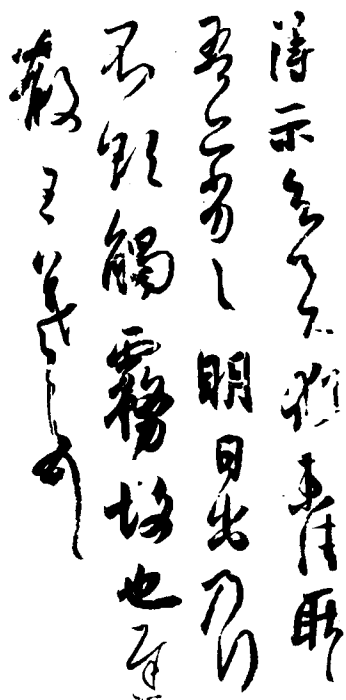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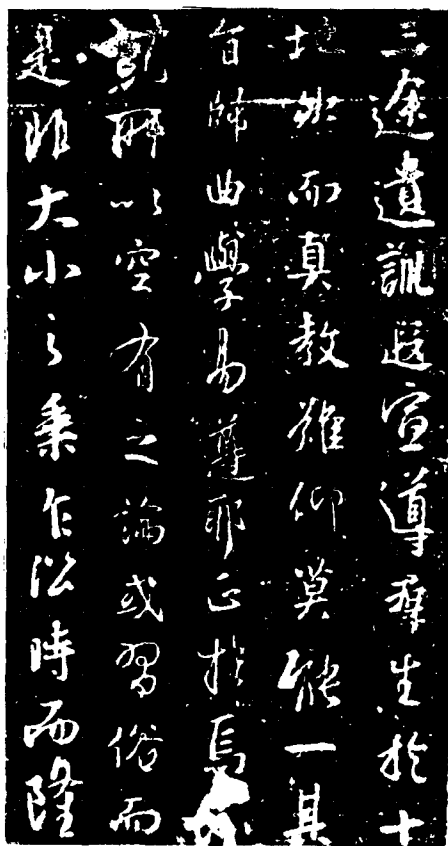


图6 怀仁《集王书圣教序》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人称“大令”。对其行草书,历代评价甚高。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吾谓行草之美,亦在‘杀字甚安’、‘笔力惊绝’二语耳。大令沉酣矫变,当为第一。”张怀瓘《书断》评价王献之行草:“至于行草,兴会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至于王献之的行草的地位,张怀瓘在《书议》中做好了最好的评价,其《书议》谓:“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

王献之的传世行书法帖有《廿九日帖》(见图7)、《中秋帖》(见图8)、《保母砖志》、《十二月帖》、《鸭头丸帖》(见图9)、《地黄汤帖》(见图10)等。《地黄汤帖》又称《新妇服地帖》,真迹久逸。存世旧临本凡六行,计四十四字。笔法爽利挺拔,遒劲酣畅,多用侧笔。刻本见《阁帖》、《大观帖》、《三希堂法帖》等丛帖中。《保母砖志》,传为晋兴宁三年(365)王献之书。《佩文斋书画谱》引赵孟頫评论:“《保母碑》虽近出(宋嘉泰二年,即1202年,出土于黄岗,在今绍兴境内),故是大令当时所刻,较之《兰亭》,真所谓固应不同。世人知爱《兰亭》,不知此也。若欲学书,不可无此。”有《三希堂帖》等翻刻本传世。《十二月帖》,真迹久佚,仅见刻本。文凡五行三十一字。宋米芾《书史》评云:“此帖运笔如火筋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米氏觅得此帖及王羲之《王略帖》,谢安《八月五日帖》后,因名其室为“宝晋斋”。《中秋帖》,真迹久佚。存世旧摹本传为宋米芾从《十二月帖》中临出。清高宗弘历以此与《伯远帖》、《快雪时晴帖》合藏一处,并名其室曰“三希堂”。《鸭头丸帖》,墨迹绢本。因起首“鸭头丸”三字得名。卷后有宋高宗亲书赞语:“大令摘华,夔(xìng,远)绝今古,遗踪展现,龙蟠凤翥,藏诸巾袂,冠耀书府。”不过是否为献之真迹,学术界尚无定论。

图7 《廿九日帖》

图8 《中秋帖》

图9 《鸭头丸帖》

图10 《地黄汤帖》

晋擅行书者，“二王”以外，尚有很多。如给我们留下《伯远帖》的王珣，以及王徽之。王珣乃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珣之兄。徽之乃羲之之子。《宣和书谱·行书二》称：“其作字，亦自韵胜，羊欣谓尤专于行草，信不误矣。然律以家法，在羲、献间，特未可以甲乙论云。”传有《新月帖》在《万岁通天帖》卷中。

东晋行书以“二王”为代表，王羲之创立了“行楷”的最高典范，王献之则创立了“行草”的法则。唐代在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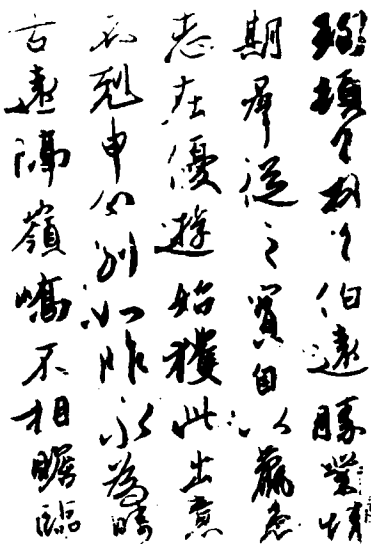


图 11 王珣《伯远帖》(墨迹)

二王徽之《新月帖》
 百告... 念痛... 不可任...
 必食不吾... 幸芳... 颖勿...
 以食不吾幸芳颖勿

图 12 王徽之《新月帖》

民的倡导下，崇尚“二王”，欧、虞、褚在行书上都有极深的造谐。不过唐代行书在继承二王的基础上有重大突破的书家，当推颜真卿和李邕。

颜真卿(709 - 785 或 704 - 784) 字清臣。师古五世从孙。唐琅邪临沂(今属山东省)人。官平原太守，历迁刑部尚书、太子太师，赠司徒，封鲁国公，谥文忠。世称“颜平原”，又称“颜鲁公”。行书承续二王而自成新貌。刘熙载《艺概》谓：“苏、黄论书，但称颜尚书、杨少师，以见与《圣教》别异也。其实颜、杨于《圣教》，如禅之翻案，如佛之心印，取其明离暗合。”“明离”故有自家面貌，“暗合”故得羲之行书之神理。颜真卿行书又富于篆籀之气，冯班《钝吟书要》谓：“颜行如篆如籀，苏、米皆学之，最宜留心。”

颜真卿传世的行书法帖较多，如《祭侄文稿》、《争坐位稿》、《与蔡明远帖》、《鹿脯帖》、《送刘太冲序》、《送裴将军诗》等。

《祭侄文稿》(见图 13)，乾元元年(758)书。此帖被誉为“颜氏行书第一”，“天下行书第二”，对后世影响极大。此帖系稿本，无意于书，而神彩飞动，超神入圣。张晏云：“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端楷终于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心手两忘，真妙见于此也。”陈深谓：“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或若篆籀，或若镌刻，其妙解处，殆出天造。”吴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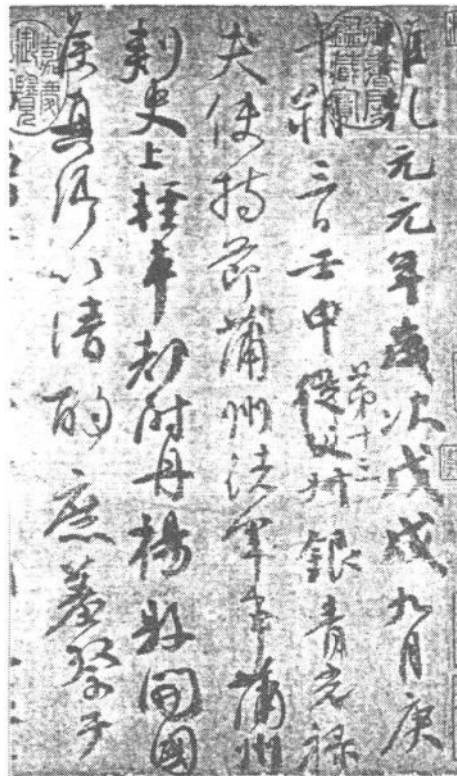


图 13 《祭侄文稿》

旋《初月楼论书随笔》云：“慎伯谓平原《祭侄稿》更胜《坐位帖》，论亦有理。《坐位帖》尚带矜怒之气。《祭侄稿》有柔思焉。藏愤激于悲痛之中，所谓言哀已叹者也。”

《争坐位稿》(见图14)，亦称《与郭仆射书》。唐广德二年(764)书。据传真迹有七纸。宋时藏长安安师文家，安氏据以上石。后真迹离散亡佚，遂仅有刻石传世。苏轼曾于安氏处见真迹，其《题鲁公书草》称：“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米芾《海岳名言》谓颜真卿的“与知远《争坐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其《书史》又谓：“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奋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谓：“《争坐位帖》，宋苏、黄、米、蔡四家书皆仿之。唐欧、虞、褚、薛诸家，虽刻画二王，不无拘于法度。唯鲁公天真烂漫，姿态横出，深得右军灵和之致，故为宋一代书家渊源。”杨守敬《学书述言》谓：“行书自右军后，以鲁公此帖(《争坐位》)为创格，绝去姿媚，独标古劲。何子贞推之出《兰亭》上。”孙退谷《庚子消夏记》云：“宋拓鲁公《坐位帖》及二《祭文》(《祭侄稿》与《祭伯父稿》〈见图15〉)，皆手稿也。而《坐位》一帖，尤为米元章所极力规抚不能得其仿佛者。盖其书郁勃奇宕，浑以天行，而无迹可求，故令人自远也。”刘熙载《艺概》则谓：“《坐位帖》，学者苟得其意，则自运而辄与之合，故评家以为方便法门。然必胸中具磅礴之气，腕间瞻真实之力，乃可语庶乎之诣。不然，虽字摹画拟，终不免如庄生所谓似人者矣。”

明孙鑛对《争坐位帖》分析得更为细致，其《书画跋跋》称：“此帖首十余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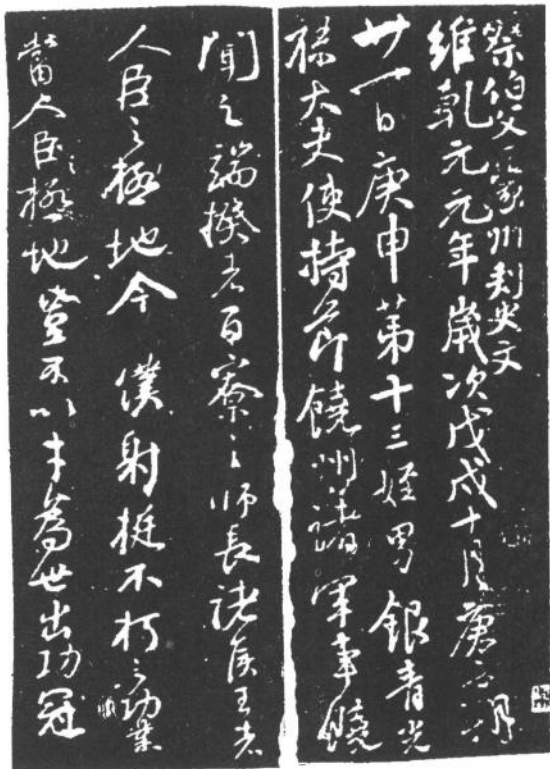


图14 《争坐位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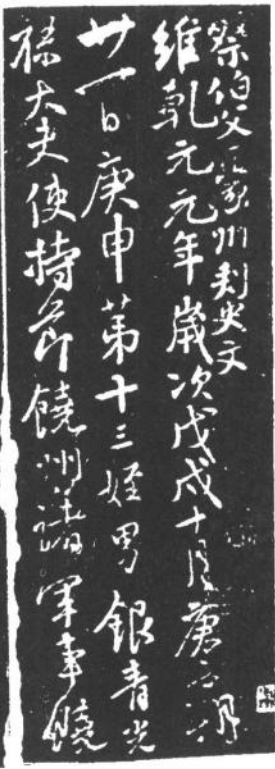


图15 《祭伯父稿》



图16 《送裴将军诗》

觉屈强未舒，至‘仆射指’以下乃始活泼运动；至“皆有等威”后又更浑化入妙；结末数行，笔已倦，意已懈，而余兴淋漓，更出屋漏痕迹。”

《送裴将军诗》(见图16)，传为颜真卿书。原迹久佚，仅有刻本流传，以《忠义堂帖》本为佳。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谓：“颜鲁公《送裴将军诗》，书兼正行体，有若篆籀者。其笔势雄强劲逸，有一掣万钧之力，拙古处几若不可识。然所谓印印泥、锥画沙、折钗股、屋漏痕者，盖兼得之矣。”杨守敬《学书述言》谓：“《裴将军诗》，奇崛雄伟，不可逼视。”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颜平原之《裴将军》，藏分法于奋斫之内。”梁嗽《评书帖》谓：“《裴将军》字，看去极怪，试临之，得其仿佛，便古劲好看。”此帖或拙或巧，融雄放、婉妍于一炉，虽有狂怪、粗俗之讥，而不失为独树一帜的佳作。

《与蔡明远帖》(见图17)，为鲁公晚年书中精品。朱长文《续书断》谓：“其真行绝妙，所谓长空游丝，虫网络壁者，吾于《蔡明远帖》见之。”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谓：“余近来临颜书，因悟所谓折钗股、屋漏痕者，唯二王有之，鲁公直入山阴之宝，绝去欧、褚轻媚习气。东坡云‘诗至于子美，书至于鲁公’非虚语也。颜书唯《蔡明远序》尤为沉古。米海岳一生不能仿佛，盖亦为学初唐诸公书，稍乏骨气耳。”

《送刘太冲序》(见图18)，原迹久佚。宋庆元五年(1199)刻于今江苏潭水。帖分上、下两截，上截文凡十三行，下截文凡十七行，每行十二至十四字。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此帖称：“郁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别有异趣。米元章谓‘如龙蛇生动，见者目惊’，不虚也。宋四家书，皆出鲁公，亦只《争坐帖位》一种耳，未有学此序者，岂当时不甚流传耶？”此帖《忠义堂帖》、《戏鸿堂帖》均有翻刻。

《刘中使帖》(见图19)，或称《瀛州帖》，传为颜真卿书。文凡八行，计四十一字。运笔古劲酣畅而不露锋芒，结体跌宕多姿而悉合矩矱。明代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引文证明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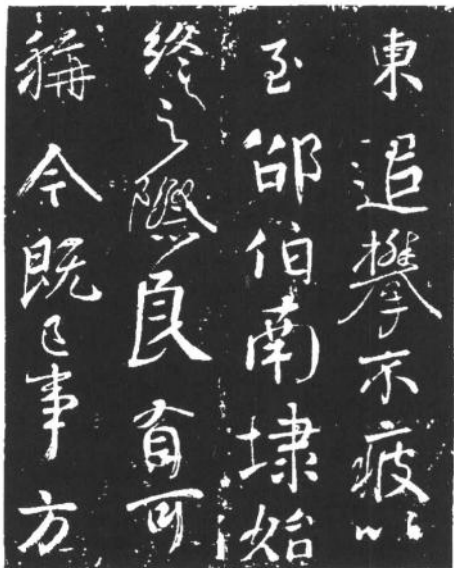


图17 《与蔡明远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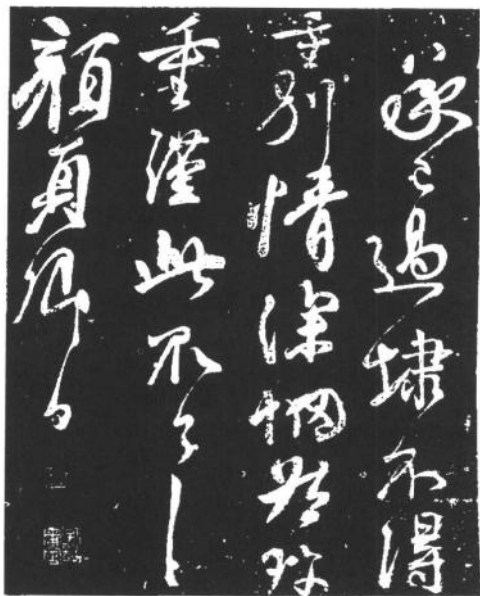


图18 《送刘太冲序》

“神气爽然，米氏所谓‘忠义映发，顿挫郁屈’者，此帖诚有之。”

在行书发展史上，颜真卿的书法是一座丰碑，凡习行书者切不可等闲视之。宜作深入研究，其获益与受启发必然会很多。

李邕（678—749）字太和。唐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官汲郡、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父名善，为《文选》作注，邕能补益其意。邕放荡不羁，才大遭忌，被奸臣李林甫所害，年七十。邕为文长于碑颂，且多自书。杜甫有诗赞曰：“千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谓：“当时奉金帛求邕书，前后所受巨万计，自古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吕总评其书‘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至于题署当以邕为最。”

李邕行书师承右军，而加以变化出新。《宣和书谱》谓：“邕精於翰墨，行草之名尤著。初学右军行法，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李阳冰谓之‘书中仙手’。”项穆《书法雅言》谓：“李邕初师逸少，摆脱旧习，笔力更新，下笔挺耸，终失窘迫，律以大成，殊越轂率。此行真之初变也。”朱履贞《书学捷要》谓：“历观古帖，凡长画皆平，是以行间整齐，无倾侧之患。唯李北海书，横画不平，斯盖英迈超妙，不拘形体耳。”王文治《快雨堂题跋》谓：“以荒率为沉厚，以崎侧为端凝，北海所独。”王世贞《弇州山人藁》谓：“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见不使人敬，而久乃爱之。”

李邕行书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欧阳修、苏东坡、米芾，尤其是赵孟頫深受其影响。孙退谷《庚子清夏记》云：“北海书，宋初人不甚重之，至苏、米而稍袭其法，又至赵文敏，每作大书，一意拟之。”

李邕传世行书多为碑版。著名的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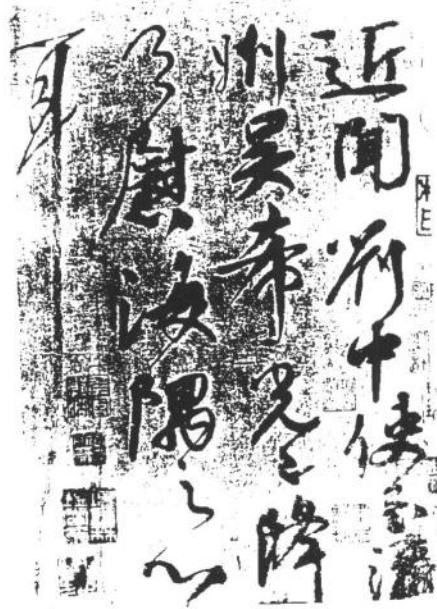


图 19 《刘中使帖》



图 20 《李思训碑》



图 21 《麓山寺碑》

《李思训碑》、《麓山寺碑》，以及《法华寺碑》。

《李思训碑》(见图 20)，开元八年(720)立于陕西蒲城县。此碑是北海得意之作。梁嘏《名人书法论》谓：“唐碑行书，的数李北海《云麾碑》，王缙、苏灵芝诸人皆不及也。北海逸气生动，通身贯注，裴休所谓‘书中仙手’也，且有英雄盖世之概。”梁嘏《古今法帖论》谓：“《云麾碑》通体逸笔，有天马行空之概。如善作文者本乎性灵，纯是天分使然。”杨慎《杨升庵集》谓：“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为第一。其融液屈衍，纤徐妍溢，一法《兰亭》。但放笔差增其毫，丰体使益其媚。如卢询下朝，风度闲雅，紫髻回策，尽有蕴藉。”

《麓山寺碑》(见图 21)，亦称《岳麓寺碑》。开元十八年(730)立于今湖南长沙岳麓公园。黄仙鹤刻，明盛世泰《苍润轩碑跋》称：“是碑笔势雄健，刻字亦出公手。大凡李公书言黄仙鹤、伏灵芒、元省己者，皆托名也。”何绍基《跋麓山寺碑》谓：“此碑沉着劲栗，不以跌宕掩其朴气，最为可贵。阴字肃穆静实，与《李秀碑》近。当时书意兼此两路，而是碑乃兼具之。”王世贞《弇州山人藁》谓：“余友俞仲蔚为余言，李北海《岳麓寺》胜《云麾》，余亟购得之。其勾、磔、波、撇虽不能复寻，览其神情流放，天真烂漫，隐隐残楮断墨间，犹足倾倒眉山、吴兴也。”杨守敬《学书迺言》谓：“李北海独出冠时。《李思训碑》，风骨高骞；《李秀碑》，雄浑深厚；《麓山寺碑》，用笔结体在二碑之间。董香光所谓右军如龙，北海如象者，最有微契。”梁嘏《古今法帖论》谓：“《云麾碑》尚飘，至《麓山寺》极沉着矣。”“《麓山寺》后《云麾碑》十年而出，骨力尤厚。……赵松雪全师此而趋秀媚，所以不能及也。”“北海《麓山寺碑》虽经饒洗，神采已非，而骨格强劲，较《云麾》为胜，明俞仲蔚已言之。当以《云麾》法学之耳。”逊退谷《庚子消夏记》谓：“《岳麓寺碑》虽已残剥，然其锋颖尚凌厉，不可一世。北海奇人，故所书亦尔。”

《法华寺碑》，李邕撰并书。开元二十三年(753)立于今浙江绍兴秦望山天衣寺。碑石久佚。仅有清·何绍基旧藏宋拓孤本传世。何绍基跋此碑谓：“李书石刻，唯《大照禅师碑》余未及见。所见者如《戒台铭》、《叶国重碑》、《婆罗树碑》、《东林寺碑》皆翻刻失真。《李思训碑》、《任令则碑》、《端州石室记》、《麓山寺》、《李秀碑》、《卢正道碑》、《灵岩寺碑》、《龙兴寺碑》，各造妙境。而纯任天机，浑脱充沛，则《法华寺碑》为最胜。”

唐代在行书上对当时和后代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一位帝王书家李世民，即唐太宗，高祖李渊次子。贞观初李世民锐意临习右军真迹，人间购募殆尽。促成了整个社会的崇王之风，奠定了王羲之在书法史的地位，对其后的中国书法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李世民在行书上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首开了行书入碑的先河。钱泳《书学》谓：“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

唐太宗的行书，历史上亦多有较高的评价，唐窦泉《述书赋》称：“太宗则备集王书，圣鉴旁启，虽躐间井，未登阶陛。质讷胜文，貌能全体。兼风骨，综法礼。”黄庭坚《山谷题跋》谓：“太宗英睿不群，所学辄便过人。末年诏书，有魏晋之风，亦是富贵后，能不废学尔。”张耒《宛丘集·跋唐太宗真迹》称：“《官法帖》帝王部中，有太宗书真行千余字。观其用笔精工，法度粹美，杂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而其雄迈秀杰之气，则冠诸书者。”梁嘏《名人法书论》谓：“观《淳化阁》中唐太宗字，逸气蓬勃。具此本领，无怪其卑屑王大令也。”行书代表作品有《晋祠铭》、《温泉铭》和《积时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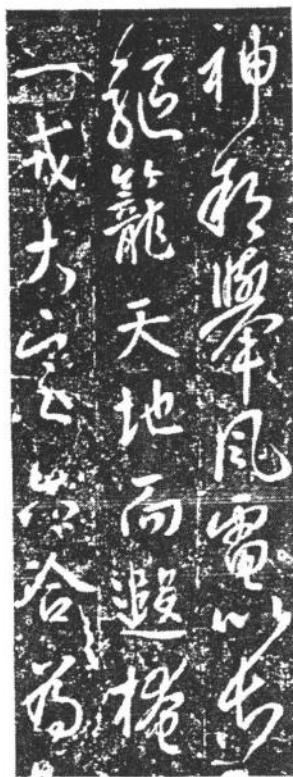


图 22 《晋祠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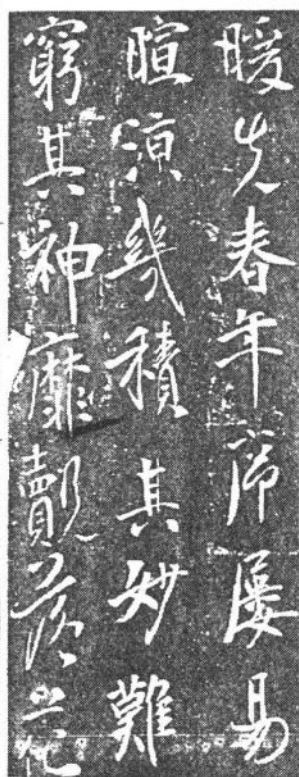


图 23 《温泉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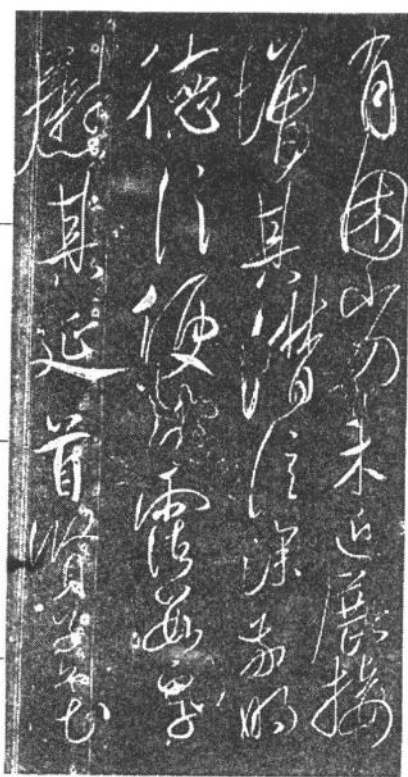


图 24 《积时帖》

《晋祠铭》，行书碑刻。贞观二十一年(647)立于山西太原晋祠。赵崧《石墨镌华》称：“太宗制文并书。全法《圣教》、《兰亭》，而纵横自如。”清代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称：“书法与(后来)怀仁《圣教序》极相似，盖其心摹手追右军者深矣。”杨宾《大瓢偶笔》称：“今观此碑，绝以笔力为主，不知分间布白为何事，而雄厚浑成，自无一笔失度。”

唐善行书若尚有陆柬之(虞世南甥)。传世书迹有《文赋》。文凡一百四十行。卷后有赵孟頫、李侗、揭傒斯等人题跋。赵孟頫跋称：“唐初善书者，称欧、虞、褚、薛，以书法论之，岂在四子下耶。然世罕有其迹，故知之者希耳。”李侗跋称：“其笔法皆自《兰亭》中来，有全体而不变者，识者知之耳。”揭傒斯跋：“唐人法书结体遒劲，有晋人风格者，唯见此卷耳。”

杨凝式(873-954) 字景度。五代梁华阴(今陕西省)人。历仕梁、唐、晋、汉、周五代。佯狂不任事，时人呼为“杨疯子”。累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杨少师”。赵构《翰墨志》称：“杨凝式在五代最号能书，每不自检束，号杨疯子，人莫测也。其笔札豪放，杰出风尘之际。历后唐、汉、周，卒能全身名，其智与字法亦俱高矣。”刘熙载《艺概》谓：“五代书，苏、黄独推杨景度。今但观其书之尤杰然者，如《大仙帖》，非独势奇力强，其骨力谨严，真令人无可寻间。”

杨凝式的书法自颜真卿、怀素而入二王之妙，遗貌取神，别具新意，历代多精到入理之评。刘熙载《艺概》称：“杨景度书，机括本出于颜，而加以不衫不履，遂自成家。然学杨者，尤贵笔力足与抗行，不衫不履，其外焉者也。”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谓：“杨景度书自颜尚书、怀素得笔，而溢谓奇怪，无五代衰茶之气，宋苏、黄、米皆宗之。《书谱》曰‘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景度之谓也。”“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